

拍案不再惊奇

徐怀谦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徐怀谦 / 著

拍案不再惊奇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拍案不再惊奇/徐怀谦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2

(苦丁文丛)

ISBN 7-5039-2141-2

I. 拍… II. 徐…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0302号

拍案不再惊奇

著 者 徐怀谦

责任编辑 蔡宛若

封面设计 雅典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2年2月第1版

200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8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141-2/1·959

定 价 17.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 录

- 1 第一辑 反思历史
- 3 非常的温情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
启示录之一
- 6 沉默的自由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
启示录之二
- 9 同样是书生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
启示录之三
- 13 时宜与真理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
启示录之四
- 16 玉碎与瓦全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
启示录之五

20	论狂狷
24	谏的悲剧
28	理性的晨曦
31	矫情可嘉?
34	最是从容不易学
37	海瑞的尴尬
40	上有所好
44	上有所忌
47	皇帝之死
50	皇帝之烂

53	第二辑 现实出击
55	酒精中的中国
58	从教授的架子说到教授的风采
62	“挤”的哲学
65	必要的丧失?
68	范仲淹, 谁与你同行?
72	中国人的幽默
77	“洋垃圾”对中国说不
80	文明的高度

84	站着的“上帝”
86	如何一致？
89	承诺制，但愿不是一阵风
92	和平年代的“战争”
94	面子问题
97	腐败岂可职业化？
100	谁来把关？
103	新闻的力度
106	50名大学生沉沦感言
110	想起了梁思成
113	“下乡”与反哺
116	骨头的硬度
120	衙内与牛二
123	“水比奶贵”不须惊
126	“解放”的歧路
129	突然冒出个“封杀”
133	水管还是钢管？
137	在洪水面前
141	人性的辩证法
145	演戏

149	成名术还是速朽术?
152	拍案不再惊奇
155	露脸
158	新“神话时代”
161	红色的猪圈与黑色的形象
164	死人也烦恼
166	小骂大帮忙
169	排队
172	贪官是惯出来的
175	现代成人游戏点评
179	七月未必是黑色
182	文人与做官
185	“国家形象”是什么?
188	谁是真正的祸水?
191	不合时宜的真话
194	介绍一个治贪偏方
197	贪官的“人情味”
201	驳“贪官有功”论
204	清官戏热播的冷思考
206	成也新闻,败也新闻

209	将法治进行到底
211	隔与不隔
214	岂有文章倾社稷
217	我们离小康还有多远?
220	一边……一边……
222	不悲楼兰今不见
224	官场是个什么场?
227	最后的微笑者
230	“运动治国”
232	“红楼”的启示
235	缺位·越位·错位
238	鲁迅的热闹及其他
241	拟一个县委书记的申诉
243	“农村剩余劳动力”存疑
246	假如末日来临
249	在法治的名义下
253	第三辑 书里书外
255	寂寞学术 悲凉人生
259	更高的规律

263	文化的良心
267	可贵是书生
271	艺术家的童心
274	品味自己
277	为“享受生活”正名
280	有聊才读书

285	第四辑 自在者说
287	人
290	历史
292	真
295	孤独
298	爱

后记	(303)
----------	-------

第一辑 反思历史

非常的温情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启示录之一

提到“文革”，大家就会想到打、砸、抢，想到“阴谋”与阴谋，想到窝里斗。但我们也注意到，在那个非常的年代，在某些单位、在某个区域，因为一把手的纵横捭阖或因为群体的良心未泯，在这个小环境内，竟有一股温情的遗留，它涌动着，生长着，滋润着每一个受益者的心田，以至于多年以后，当他们回首“文革”，对于牛棚、对于苦难，他们的心境已经变得平淡，惟独对这份温情，他们却觉得历久弥新，愈久愈醇；而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我们从中对人性、对历史也有了更多的感悟。

4 拍案不再惊奇 / 反思历史

我想到了两本曾风靡一时的书《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心香泪酒祭吴宓》。这里我无意于褒贬两本书的优劣，我所关心的是陈寅恪和吴宓晚年的不同命运。陈寅恪的晚年固然是不幸的，他的目已盲，他的腿已残（注意，是天灾而非人祸），他缺少助手，缺乏资料，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但因为有了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保护，他至少免掉了吴宓所遭受的坐“喷气式”、被打折腿之类的凌辱，甚至写出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难言扛鼎却极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没有陶铸，我们不敢想像陈寅恪的晚年会不会像吴宓一样凄凉悲惨。

在那个“他人即地狱”的年代，作家杨绛以她特有的幽默，把她周围的同事称为“披着狼皮的羊”。她虽然也被剃过“阴阳头”，打扫过厕所，挨过这样那样的批斗，但她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外文所的同事和革命群众们，帮她做砖、捆箱子、锄草、拉煤、查资料，使她在乌云密布的日子里看到了天边的光辉。她说：“按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孽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为金色。”

她总结道：“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面对上述事实，我想了很多。十年浩劫充斥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窝里斗的事实，曾经使我对知识的异化作用做过夸大的理解，而纯朴、善良的中国农民、“革命群众”对落难“右派”的无私关怀（如张贤

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更强化了我的这种误解。但是在做过进一步的考察之后,我觉得事情并非那么简单。知识从来就有正负之分,我们看到一些大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变得唯唯诺诺,甚至两面三刀,落井下石,错不在知识,而在于他的本性发生了变化,才使他知识构成中的负面成分凸显出来,压倒正面成分,使他变得连一个没有文化的善良农民都不如。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自古多侠义之士,一个人只要良心未泯,他就会更多地汲取知识的正面养分,减少乃至杜绝它的负面影响。陶铸是这样的人,杨绛身边的同事也是这样的人。

但愿温情不再与知识成反比,但愿温情不仅仅是一种呼唤。

(原载《文汇报》1999年9月4日,《杂文选刊》1999年第11期转载,入选《1999中国最佳杂文》)

沉默的自由

——“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启示录之二

反思“文革”、反思“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人们越来越多地用到一个词“失语”。所谓“失语”，既有学术方面的涵义也有政治方面的涵义，或者说，两者是二而一的关系。许多三四十年代著作等身、见解独特的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只能用同一支笔翻来覆去地抄写检讨材料或创作“歌德”文学。学界的这种失落和全国上下“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是相辅相成的。

学术凋零、文化衰颓固然可惜，而言论自由的丧失尤其令知识分子难以承受。知识分子就这么两件武器：口和笔（它们的指挥官是脑），现在却统统要封存起来

了。于是有人抗争，有人缄默，有人去做了吹鼓手和打手。

第一种人是可佩的。陈寅恪、梁漱溟、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是其中的佼佼者。还有选择自杀的老舍、傅雷、翦伯赞等，则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抗议，同样是铁骨铮铮，可歌可泣。

第三种人是可怜可悲的。代表人物有郭沫若、周扬和“梁效”们。他们知道自己被利用了，却甘于这种被利用，甚至自觉地利用这种被利用，做了许多对不起朋友、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在知识分子中，上述两类毕竟占少数，为数众多的是第二种人。他们的失语，是因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打成“右派”，关进了牛棚或监狱，人身自由都被剥夺了，遑论言论自由？还有的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噤若寒蝉。个别的像张东荪、张申府、钱钟书等人的沉默，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

有研究钱钟书的文章指出，三四十年的钱钟书恃才傲物，口无遮拦，臧否人物，古今独步，而“文革”期间的钱钟书缄口不言，个性尽失，有人甚至说这是“钱钟书式的虚伪”。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针对后人对侯朝宗参加清初科举多有非议做了这样的匡正：“盖建州入关之初，凡世家子弟著声庠序之人，若不应乡举，即为反清之一种表示，累及家族，或致命身之危险。……后世未解当时情势，往往做过酷之批评，殊非公允之论也。”也就是说不能把参加科举与名节问题简单联系起来。同样，“文革”时期钱钟书的沉默，也不能简单地以“虚伪”二字加以否定。每一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胡风集团是由私人信件入手挖出来的，许多“右派”分子是被朋友的三言两语揭发出来的。以钱钟书的名望

和地位，如果他仍像三四十年代那样出言无忌，谁能保证他的话不会被别人利用，变成打倒“牛鬼蛇神”的棍子？要知道世上最快的刀子是舌头啊！多少“右派”就是被这把软刀子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西方的《人权宣言》是这样定义“自由”的：“自由是在不伤害别人时做任何事的权利。”“不伤害别人”，这就是做人的道德底线。在不越过这条底线的前提下，你可以选择抗争的自由，自杀的自由，沉默的自由，但你决没有告密的自由，落井下石的自由，“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自由。从这个角度看，钱钟书选择沉默，是不应该受到过酷批评的，相反，这正是智者的一种斗争哲学。

有人说，当年的许多学者是为了生存的需要才说违心话的，认为这与其说是趋从，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中学到的求生智慧。我不以为然。关于自由，西方还有一个定义：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是自由，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才是真正的自由。与说违心话相比，沉默不是一种更能显示自由意志的选择吗？

沉默是自由的，遗憾的是，我们历来过于轻视了这份自由。

（原载《杂文月刊》2000年第4期）